

红色四明

中共余姚历史第一卷专题集（二）

余姚市史志办公室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红色四明

中共余姚历史第一卷专题集（二）

余姚市史志办公室 编
中共余姚市委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四明.中共余姚历史第一卷专题集(Ⅱ)/中共余姚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9

ISBN 7-80199-027-7

I.红... II.中... III.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
—余姚市 IV.D23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3221 号

红 色 四 明

作 者:余姚市史志办公室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邮 编:100080

印 刷:上虞丰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198 千字

印 张:8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027-7/K·18

定 价:28.00 元

序

余姚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远在七千年前，这里的先人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余姚更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为了建立新中国，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卷又一卷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余姚这块土地上就萌芽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余姚境内已有共产党人活动，1926年，余姚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抗日战争时期，余姚更是成了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回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先烈精神；回忆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鼓舞后人斗志；回忆历史，更是为了展望光明的未来。这是一套老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时间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1949年5月余姚解放，历时近30年，共分三集。

阅读这套回忆录，不仅把我们带到了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而且使我们感受到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先辈们那颗滚烫炽热的心。

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和平建设的年代，而这套回忆录所反映的是革命斗争的年代。粗粗一想，似乎没有什么可通之处，然而静心阅读，用心体味，那时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尤其是相

信依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关心爱护群众等等,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黄月樵在《余姚革命二三事》里回忆:“我们组织农会,支部的几个党员分工负责到各村,用交朋友的方法去进行发动。对不同阶级的人说不同的话,如我们对贫佃农说,地主的租这样重,缴租的时候,我们贫佃农应有权利讲话,农民应该团结起来,向富户减租,特别是荒年、饥寒的年头,地主不应该剥削我们。对富裕农民,我们主要宣传要保护农具、保护农作物。对知识分子,向他们宣传我们组织农会是要改良农具、采办优良种子、采办肥料等等。”这是多么高超的工作艺术!

而今,余姚这座红色的古城,正以强劲的步伐,朝着经济更具实力,文化更富特色,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趋和谐,人民生活更为殷实,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化和谐宜居城市目标迈进。我们出版这套回忆录,希望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养料,以期先辈的革命精神绵延不竭,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发扬,推进科学发展观在余姚的伟大实践。

中共余姚市委副书记 诸晓蓓

二〇一四年九月

红色四明

——中共余姚历史第一卷专题集(Ⅱ)

目 录

序	李浙闽(1)
浦东部队渡海到浙东敌后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	顾德欢 吕炳奎(1)
回忆浦东游击队	连柏生(10)
“老三纵”的前前后后	朱人俊(15)
浙东四年(节选)	谭启龙(22)
埋伏在余姚城的日子	洪舒江(47)
梁弄战斗	刘亨云(54)
围攻许岙	张文碧(59)
难忘的岁月	余也萍 韩心一(69)
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工作的一些体会	张文碧(79)
浙东游击纵队的政治教育工作	江 岚(89)
浙东区党委党训班整风纪实	鲁 冰(93)
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情况	何克希(103)
洋菜场事件	张 杰 俞善章(106)

自卫图存 坚持抗日	朱之光(112)
三北游击队和三五支队称呼的来历	叶清达(114)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陆慕云(119)
独特的金融	朱宝镛 金理祥(130)
陆埠区减租斗争的情况回忆	徐 野(150)
1943 年—1945 年浙东根据地税收工作情况	芦宝伟(158)
我保管抗币的经过	李志涛(160)
回忆我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商业工作	傅焕文(162)
敌伪时期浙东新四军的上虞联络站	曹森宝(166)
忆抗日战争时期浙东四明社教队	史 岩 王 琰(182)
抗战时期四明山根据地文教战线工作	楼适夷(193)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外事三则	顾春林(196)
日军反战同盟在四明山根据地	陈 阜(210)
浙东韬奋书店回忆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212)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芝林纸厂 ...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220)
我第一次见到浙东新四军	宋公明(222)
记浙东根据地的一个儿童节	吕倩如(225)
惜别四明	谭启龙(227)
忍让为国,挥泪告别浙东父老	刘亨云(232)

浦东部队渡海到浙东敌后 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

顾德欢 吕炳奎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宁绍一线之后，浦东部队陆续渡过杭州湾，转战浙东敌后地区。1942年成立浙东区党委之后，浦东与整个淞沪地区的党组织就划归浙东领导，淞沪地委是浙东区党委领导下的4个地委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渡海经过淞沪地区，浦东、浦西老区的人民，含泪送别自己的子弟兵。浦东与整个淞沪地区和浙东抗日根据地有着深厚的血肉联系。

1937年年底，日军攻占上海、南京、杭州。上海郊区的浦东、浦西、浦南十来个县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仓皇撤走，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的大灾难，也加快了人民的觉悟。许多地区，群众自己出钱买枪，组织起来，抗日保家乡。在1927年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遗志，疯狂反共之后，上海郊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曾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未能取得胜利，至抗战开始时，党的组织几乎已全部破坏。但很多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如浦东的姜文光、姜文奎、周大根、吴建功等，青浦的顾复生、顾达真，黄琴芝等，千方百计到上海找到了党的关系。

他们和当时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从事抗日斗争的骨干与领导者。恢复组织不久的江苏省委即抽调干部下乡工作,建立了党的浦东工作委员会和青浦工作委员会。有些地方的进步青年与民主人士,如嘉定的吕炳奎,昆山的陶一球,南汇的连柏生,组织了抗日武装,部队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吕炳奎、陶一球、连柏生都入了党。抗战爆发时,各县都有一批知识青年(包括一些党员)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有的后来到了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有的学习后又回到家乡参加游击区工作。从上海下乡到郊区游击区工作的工人、店员、学生等有好几百人。上海党组织大量出版进步报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对郊区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促进作用。在日本侵略者逐步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时,许多挂着抗日招牌的游杂部队纷纷公开投敌,只有我党领导的几支人民武装,人民习惯称呼的连柏生部队、顾复生部队、吕炳奎部队、陶一球部队,始终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上海郊区人民抗日自卫的4面旗帜。

1939年夏,根据陈毅的指示,叶飞和何克希、吴琨等同志率领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简称“江抗”)东进,直达上海近郊,在昆、嘉、青地区活动了大约两个月,与地方党、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土匪武装,给上海市区与郊区人民以极大鼓舞。这次“江抗”东进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打通了从苏南根据地(茅山地区),经“澄锡虞”、“苏常太”(“东路”)地区,直到上海近郊的联系,这种大胆阔步前进的战斗作风,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是我们后来开辟淀山湖地区,特别是敢于渡海转战浙东敌后的重要思想基础。

日本侵略者很快发现,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对它的最大威胁,是必须集中进攻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经常处于频繁的战斗之中,再加是平原水网地区,交通发达,斗争是很艰苦的。

1938年年底,南汇抗卫第二中队遭日军优势兵力进攻,在海滩激战终日,周秋萍与战士30多人壮烈牺牲。1939年春,青浦三支队一中队一部遭日军许多小汽艇围攻,驻地四面是水,未能突围,中队长王正方和战士20多人全部牺牲。敌人还时常残酷杀害我基本区群众,最严重的一次是1940年4月对青东地区的大“围剿”、大屠杀,群众惨死者千人以上,民房被焚数千间。但许多基本区群众,在日军的大暴行面前,宁死不屈,誓死保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勇就义。

青东大屠杀之后,顾复生部队分散转移到东路根据地。吕炳奎部队已于1939年随“江抗”主力西行。上海党先后把嘉定、青浦与浦东的党组织移交给谭震林负责的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谭震林决定建立“淞沪中心县委”(先是“昆嘉青中心县委”),以便各地区直接联系,互相支援,有利于游击战争的灵活展开。根据东路领导的指示,中心县委以昆山东乡陶一球的基本区为立足点,依靠昆、嘉、青三县老区的基础,重建了一支主力游击队“昆青支队”,于1940年秋,跨越吴淞江向南发展,经半年时间,从吴淞江至淀山湖北部,东南至青松交界的天马山、小昆山地区,西至苏嘉铁路附近,形成一个抗日游击区。在我军基本活动区,还建立了半政权性的办事处、地方武装、群众团体与党的组织,可以说是一小块游击根据地了。浦东部队曾一度渡过黄浦江,眼见打通浦东、浦西联系的任务即可完成。然而,1941年春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忠救军”从浙西分路向我东路根据地进攻,我昆青支队指挥员周达明率部在淀山湖边的谢石关村宿营时,突遭顽军优势兵力围攻,周达明与大多数指战员经过顽强战斗,英勇牺牲。顽军进攻兵力占绝对优势,东路领导决定昆青支队全部转移至苏常太根据地。

1941年5月,新成立的江南区党委(谭震林为书记)决定把

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把浙江的“海北五县”也划归路南特委领导。这样，在沪宁铁路之南(故称路南特委)，西至苏嘉铁路，东至上海近郊、浦东海边以及沪杭铁路至杭州湾之间，这一大块地方建立了统一领导。当时只有浦东有武装，其他 10 多个县，只有党的秘密工作，或正处在从游击战争转入秘密工作的调整过程中，困难很多。特委工作的重点是抓浦东的武装斗争。自日军占领宁绍一线之后，浦东部队陆续转战到浙东敌后开辟工作，乃逐步以浙东工作为重点了。

浦东工作，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好的经验。1938 年初就建立了党的浦东工委(简称“浦委”)，陈静任书记，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1940 年年初，江苏省委派金子明接替陈静任“浦委”书记，坚决执行江苏省委与东路领导的指示，工作更顺利了。在“浦委”集体领导下，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陈文祥为书记)、军事工作委员会(朱亚民为书记)，伪军工作委员会(朱人俊为书记)。这个组织形式，有利于调动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浦东的知识分子干部多，中上层关系多，“浦委”完全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许多干部，在东路教导队学习后，回到或调到浦东工作。五支队在朱亚民、蔡群帆、张席珍等的领导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党的建设，积累了在敌人据点林立的平原地区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作战方法，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浦委”把伪军工作的重点放在伪 13 师 50 团，在该团中上层争取了很多同情分子，在下层好几个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经常借口出发“剿匪”到乡间流动，以锻炼夜行军能力，在防区内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当特务、汉奸的民族败类加以肃清，并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使干部和战士都有思想准备，在适当时候，能迅速拉出来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的事实证

明,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领导的这项工作是完全成功的。这样,党在浦东就有了两支能够依靠与调动的武装力量。

1941年4月,日军攻占宁波、余姚、绍兴一线,以巩固沪、杭、甬及舟山群岛这个重要侵略基地,是它准备发动更大军事冒险的一着棋子。“浦委”的同志很注意浙东形势的发展,对情况的了解也比较具体,这是因为他们与驻在浙东的宗德公署薛天白有统战关系,加之来往于杭州湾的商人多,所以消息很灵通。三北沦陷后,他们又派少数武装前往侦察,发现三北地区像所有敌人新占领地区一样,也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浦委”认真研究了新的形势,根据上级党指示的精神,提出了一方面坚持浦东,进行反“清乡”斗争;一方面把浦东党能够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有准备地渡海到三北敌后,协同当地党组织,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谭震林完全支持这个方针,经常给予指示与关怀。从6月至9月,浦东党的两支武装力量就分批到达浙东。原五支队的主力游击队,由蔡群帆、林有璋、张席珍等率领,在三北的较东边的地区活动;从50团拉出的部队,由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负责,在较西边的地区活动,对外还是两支独立的部队。特委派军事部长吕炳奎于9月中旬到达浙东,在党内统一领导这两支部队。同年秋冬,在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紧张时刻,谭震林调东路特委委员王仲良来参加路南特委,并指定王常驻浙东工作。在新四军6师从东路根据地北移之前,谭震林又派机要员康志荣、台长王平到浙东建立电台,并通知成立浙东军分会,指定吕炳奎为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为委员,以进一步加强对浙东部队的领导。

浦东部队虽已称得上是一支主力游击队,但终究是在比较狭小地区土生土长的,一旦远离家乡,独立转战到浙东新区,人地生疏,十分渴望能与当地党组织密切合作。但在皖南事变之后,华中局与浙江省委的联系还相当困难,因此一时不能经过上

级党的介绍使双方取得正式联系。浙江党的基础是很好的,但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后,处境困难,对特务活动不得不提高警惕。浦东部队一到三北,坚决抗日,纪律严明,与其他杂色武装迥然不同,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而我们地方党的同志则不能不以怀疑的态度来观察它。除了由一些上层工作的党员在公开活动中与部队接触、进行了解外,还曾派党员设法“打入”这支部队进行“深入”考察。不久,双方终于互相取得了信任。我们和宁绍地区党的负责人杨思一、王文祥,以及余姚、慈溪、镇海县的地方党取得了直接联系。地方党的同志,当然非常渴望能有一支党直接领导的主力游击队来支援他们,因此双方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浦东部队转战到浙东新区之后,之所以能很快站住脚跟,与浙江地方党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

浙东军分会成立后,首先是加强部队的建设。在军分会的统一领导下,设立了五支队的工作委员会(蔡群帆为书记,林有璋、夏治行为委员)和“三纵”的工作委员会(王仲良为书记,朱人俊、方晓、吴建功为委员),分别负责两支部队的日常工作。成立了教导队,统一培训两支部队的军政干部,有些干部按工作需要作了统一调配。上面谈到,浦东部队不少干部在东路教导队学习过,故教导队和整个部队的经常性教育,基本上都是“江抗”与新四军6师的一套,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又有提高。在部队内部,全体指战员都知道,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不这样做,部队就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也不可能取得群众的拥护。群众对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心里也是有所了解的,一支部队,终究和秘密党不同,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隐蔽党的领导。在此之前,淞沪地区的基本区群众,早就认定,顾复生部队、吕炳奎部队、连柏生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公开用新四

军的番号,和不公开用新四军的番号,在当时的斗争条件下,还是大不一样的。在相公殿战斗之后,薛天白要我们去报告战绩,我们就叫林有璋带了一些礼品去拜访他,薛很高兴,对林说,“五支队”太红了一些,我给你一个“三支队”的番号,当场就给了林一张三支队支队长的委任状,并要林有璋改名为林达。林回到三北后,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如朱祖燮等,就设宴祝贺。以后浙东人民总是把我们的部队称做“三五支队”,可能和此事有关。朱人俊负责的部队其中先到三北的一部曾接受薛天白第三大队的番号,后来这支部队又接受了苏鲁战区第三纵队的番号,朱人俊任司令。顾小汀的部队原也在浦东活动,顾对浦东我党的情况是有些了解的,到三北后对我们的态度仍较好。对各县的“国民兵团”等,我们也多做工作,尽量争取团结抗日。在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又有我军坚决抗日、纪律严明,保护人民利益的实际行动,三北地区较有声望的地方士绅对我方态度都比较友好,部队主要领导人也经常亲自和他们交谈,商讨团结抗日大计。

经过一年时间的共同努力,至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前后,三北地区,西起临山,东至蟹浦,沿海岸东西近二百里,南北数十里,初步形成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比起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所熟悉的浦东或昆嘉青老区来,是宽广得多了。我们很重视扩大部队的活动地区,除三北外,“山南”与姚江两岸的某些地方我军都曾到过。我们的方针是:日本侵略者到达的一切地区,我军都要打过去,并向人民宣传抗战的道理,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同时,由地方党调派干部,建立了很多个县、区办事处,有一定的自卫武装,是半政权性的机构,既是部队的后勤部,又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活动中心。后来又设了一个总办事处。我们的主力游击队始终保持着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老传统,部队每到一处,就进行调查研究,开展群众工作。~~宁勿~~党组

织是有战斗力的,群众基础很好,他们有很多政治、文化工作干部,再加之浦东部队的文化水平较高,故三北游击根据地内的政治、文化生活相当活跃。这一年三北敌后地区的斗争形势还比较好,工作开展比较顺利,我们都很关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全国抗战的整个形势。皖南事变发生不久,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尚未过去,周达明部队在淀山湖边的惨痛遭遇记忆犹新。浙东远离苏南、苏中根据地,是一个突出孤立的小根据地。在姚江南面的四明山区,就有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形势的可能变化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无论是反抗日军的侵略,还是对付反共顽固派的可能进攻,我们都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尽快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江南区党委、苏中区党委、谭震林同志与粟裕同志,多次给我们指示的核心问题。领导还向我们指出:必须坚持浦东斗争,加强整个淞沪地区与海北地区的工作,开展海上与海岛工作,使我军能在杭州湾两岸机动跳跃、互为依托,我们的回旋余地还大,不要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估计过高。开展三北敌后抗日斗争第一年的基本情况,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大概就是这样。

1942年5月底,日军攻占金华、兰溪,继续西进。浙东军分会当机立断,立即抽调部队组成南进支队,由蔡群帆带领,6月初即从姚北出发,在诸暨北乡与杨思一会合,商定以枫桥为中心开展抗日斗争,部队活动地区,南北近百里,东西数十里,为创造会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局面。1941年浦东部队初到三北时,在相公殿伏击日军取胜,军威大震;这次南进支队初到会稽地区时,应地方人士的请求,全歼土匪徐文达部,为民除害,各界人士热烈拥护。看来,开辟新区,首战告捷,对迅速打开局面十分重要。

华中局于1941年10月就曾准备派重要干部到浙东主持工

作,加强领导。1942年春初,又专派谭启龙与吴仲超两同志到上海,由顾德欢、姜杰、吕炳奎三人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浙东的情况,由他们两人向华中局报告之后,再决定加强浙东工作的具体措施。随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于6月间在上海主持召集路南特委在沪成员顾德欢、姜杰、金子明(吕炳奎、王仲良已在浙东)开会,传达华中局指示,并决定暂由姜杰留沪,以浙东区党委特派员身份领导淞沪地区工作,顾、金均调浙东工作。“浦委”的一项紧急任务是组织船只与护送部队,和苏中地区配合,接运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领导干部,以及几百名各级党、政、军干部到浙东工作。同年七八月间,正式成立浙东区党委与三北游击司令部,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全体干部和指战员,都能照顾大局,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定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大家深深懂得,如果不这样加强浙东全党全军的统一领导,如果没有谭启龙、何克希等大批有经验的干部的到来,那么今后更重大、更艰巨的战斗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从此,浙东敌后地区的工作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华中局的关怀下,大家团结一致,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击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创立与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直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回忆浦东游击队

连柏生

一、取得番号

1938年春,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就酝酿组建革命武装,但是缺乏一个合法的名义。

这时,浦东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支队长于陶生,自称是南汇县长兼抗日保卫团团长,并任用孙运达为团附,下设三个中队。孙运达也是南汇人,也想搞点本地武装。当时我任国民党南汇县第二区区长,我们便通过孙运达取得了第四中队的番号。

二、搞到枪支

我有一个堂房姐夫,是南汇县祝桥镇商人,他们的商团藏有两支枪。我便向他宣传组织抗日武装的必要性,他也怕藏枪惹祸,便将枪给了我,这两支枪就成了我们起家的革命武器。

在南汇县四团仑镇,有一个名叫周毛纪的商人,他有一支武装,拥有枪十一、二支,却未能取得合法番号。经过会商,双方同意将两支武装合并,我任中队长,他任中队附。当时有20余人,除周毛纪外,都是当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年纪都很轻。

三、充实骨干加强领导

部队成立后,中共浦东工委从上海动员一批工人(也是难民)来当战士,同时也派来了一批政工干部。从此部队初具规模。